

吳希聖〈人間・楊兆佳〉之真實再現 與文體研究

須文蔚*

摘 要

1935 年 3 月，《臺灣文藝》上刊出了吳希聖所著〈人間・楊兆佳—形見のプロペラー〉一文。此文之寫作背景，本於當時轟動一時的楊清溪空難事件，而文章中的「楊兆佳」不但真有其人，且是當時赫赫有名的臺籍政治運動家「楊肇嘉」。透過史料與文本的比對，本研究發現，此文在書寫上並沒有虛構事實，作者之所以借用小說筆法來寫作報導文學，乃是為了真切地再現出當時臺灣知識界的反抗聲音，透過接合文藝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新形式，掙脫官方意識型態的鎖鍊，彰顯臺灣人自信與認同的重要精神。將其與楊逵的〈臺灣地震災區勘查慰問記〉（1935 年 6 月）相較，不僅寫作時間上要來得更早，而且全文結構嚴謹，人物個性型塑與場景描述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確可上溯為臺灣文學史上首篇的報導文學作品。

關鍵詞：吳希聖、楊兆佳、楊清溪、報導文學、文體論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The Re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and Literary Styles of Wu Xi-Sheng's "The Story of Yang Zhao-Jia"

Shiu Wen-W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Wu Xi-Sheng published his "The Story of Yang Zhao-Jia, the Remembrance of Propeller" on the March 1935 issue of "Literature Taiwan". The article was based on a well-known Yang Qing-xi air disaster, while Yang Zhao-Jia was a real character who was quite famous for his rol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aiwan. While we compare historical facts with the article, we find that it was a true story. The author handled reportage in a fictional style in order to convey how well-educated Taiwanese at the time resisted the ruler, trying to discard government's paradigm and manifest how Taiwanese recognize themselves with dignity. When matched with Yang Kuei's "Investigation and Assistance to Taiwanese Earthquake Areas" (June 1935), Wu's article was written earlier and better organized, with more outstanding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as well as scenes. We may well say that this article is the reportag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Wu Xi-Sheng, Yang Zhao-Jia, Yang Qing-Xi, reportage, literature style

吳希聖〈人間・楊兆佳〉之真實再現 與文體研究

須文蔚

一、前言

在 1935 年 3 月，《臺灣文藝》2 卷 3 號上刊出了吳希聖所著〈人間・楊兆佳—形見のプロペラー〉¹一文，記錄了臺灣史上第一位遭遇空難的臺籍飛行士楊清溪（1908-1934）失事後，其贊助者楊兆佳悲痛、哀悼與重新振作的過程。這篇文學作品究竟是虛構的小說？或是本於事實的報導文學？一直塵封在文獻資料中，乏人深究。

吳希聖此文以日文書寫而成，〈人間・楊兆佳〉意思應為「楊兆佳其人」²。非常明顯的，楊兆佳並非向壁虛構的人物，從諧音可以推知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臺籍政治運動家楊肇嘉。在通篇翔實的人物特寫中，主人翁不斷宣示著臺灣人的尊嚴、自信與驕傲，顯然因為主題過於敏感，因此不但用日文書寫，同時用諧音來取代「肇嘉」，但是不失其反抗殖民者的目的。至於副標題意為「紀念的螺旋槳」（形見のプロペラー），明確指的是楊清溪所駕駛「高雄號」失事後，楊肇嘉自飛機殘骸取

¹ 吳希聖，〈人間・楊兆佳〉，《臺灣文藝》，2：3（1935），頁 112-125。本文所引用內容由陳怡君翻譯、須文蔚校訂，尚未出版。

² 彭小妍等翻譯楊達全集時，將其中〈楊肇嘉傳〉中所提到的此文，翻譯為〈楊兆佳其人其事〉。日文的「人間」（にんげん、じんがん）一詞，原是據佛教梵文「*mamasya*」漢譯而來。在佛教中，「人間」指的「人所在的世界」、「人世」、「世間」。「人間」的發音にんげん是根據吳音傳至日本的，用漢音讀的話就是「じんがん」。因為有兩種發音，為了有所區別，乃將漢音定為「人世」之意，而吳音則只有「人、人類」的意思。因為容易混淆，所以而今的「人間」，多用來意指「人、人類」。因之，此文題目直譯也就是「楊兆佳其人」的意思。

下作為紀念物的螺旋槳，此事需要加以考證，以便確認是否為虛構的意象，或是真有其事的紀念品。

吳希聖在這篇文章中以「楊兆佳」的觀看視野來書寫整個事件，比較接近一般讀者熟悉的小說筆法，看似虛構。但徵諸史料，楊清溪環島鄉土訪問飛行是當時媒體注目的焦點新聞，同時楊肇嘉的傳記中有專章提到〈楊清溪飛行壯舉〉³，在《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中，更有一系列楊肇嘉推動楊清溪鄉土訪問飛行，以及懷念楊清溪身故的照片⁴。不難想見，無論是社會大眾也好，或是楊肇嘉也好，對日治時期此次環島鄉土訪問飛行，以及最後所衍生的悲劇，不僅印象深刻而且深感悲痛惋惜，絕對是真實的新聞事件。那麼作為《臺灣新民報》記者與《臺灣文藝》同仁的吳希聖，當他以小說筆法剪裁新聞報導，貼身記錄楊肇嘉對此一臺灣文化史上重大事件的反映，進行更深刻的描摹與闡釋，那麼此一文本究竟是小說？或是報導文學？實在是一個饒富趣味的問題。

吳希聖〈人間·楊兆佳〉一文跨越在人物特寫、小說與報導文學的邊界上，尤其在當時雖然已經有發達的報業，但還沒有報告文學或報導文學的理論建構，我們也很難推知作者對於文體內容的想像，但就文本所呈現出的特徵，卻深深挑動我們思索報導文學與小說的文類界線問題。

為求判定〈人間·楊兆佳〉一文文體的屬性與文類，本研究先從事件的事實面考察，探究楊肇嘉在楊清溪遇難前後的社會行動，以利辨別文字是否以再現社會真實為其目的。同時，如果該文內容均本於新聞事件的事實，則報導文學中是否容許採小說筆法的書寫？則另外應就新聞報導、報導文學與小說互文（intertextuality）的觀念，討論報導文學文體雜糅多樣的面貌，進行討論。最後，一般認為〈人間·楊兆佳〉為小說者，多半受限於報導文學必需服膺完全的客觀，本研究則以再現理論，重新界定報導文學所能承載反映真實的程度，並檢視本文再現之社會真實。

³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2007，四版），頁275-284。

⁴ 張炎憲、陳傳興，《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頁147。

二、吳希聖寫作背景介紹

（一）吳希聖其人與文學地位

吳希聖（1909-）為日治時期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乳名松茂，是臺灣淡水人。30年代，吳希聖曾加入「臺灣藝術研究會」，與王白淵、張文環、蘇維熊、曾石火、吳坤煌、巫永福、劉捷、施學習等人共同發行《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雜誌⁵。並曾擔任《臺灣新民報》記者。中日戰爭期間，潛入中國大陸參加「臺灣義勇隊」，戰後返臺，任職於臺灣糖廠、報館、華南銀行臺北總行，自退休後，行蹤不定，目前改名為陳希聖，很少有作品問世⁶。

吳希聖聞名於臺灣文壇，是他在1934年的《福爾摩沙》第3期上，發表了社會寫實小說〈豚〉，一時備受矚目。在這篇小說中，他以悲天憫人的觀點，傳達了當時臺灣農村的生活窘況，故事敘述農夫阿三所養小豬無人問津，母豬又病死，在禍不單行之下，長女阿秀悲慘地以出賣肉體來養家餬口，進而染上了性病。阿秀為了報復保正進財伯，故意將性病傳染給進財伯，隨即上吊自盡。吳希聖以犀利的文筆，刻劃出日本殖民統治下農家的苦難，以及現實社會弱肉強食的慘狀，讀之令人鼻酸。劉捷在〈光復前的文藝評論〉一文中指出，吳希聖的短篇小說〈豚〉，刊出時，極受注意，有關它的評論文字，幾乎超過作品本身的幾倍，引發了熱烈的討論⁷。當時文藝評論家張深切、徐路生都將吳希聖的〈豚〉、楊達的〈送報伙〉與呂赫若的〈牛車〉等作品，鼎足而立，讚譽為開創臺灣文學新氣象的重要作品⁸。由於吳希聖的創

⁵ 王詩琅就指出，臺灣藝術研究會成員齊整，都是後日臺灣新文學的健將，《福爾摩沙》水準也高，尤其是吳希聖的〈豚〉一作頗為人所稱道。見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聯合報》，第12版，1979/3/17。

⁶ 鍾肇政、葉石濤編選，《豚》（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

⁷ 劉捷文中誤將〈豚〉一文發表處所寫為《臺灣文藝》，應屬考證上的失誤。見劉捷，〈光復前的文藝評論〉，《聯合報》，第8版，1980/11/3。

⁸ 參閱張深切：〈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臺灣文藝》2：2（1935）。另，徐路生，〈臺灣作家論〉，《臺灣新聞報》（1935）文藝欄，指出從吳希聖「麗娜的日記」（發表於《臺灣新民報》，1933/1/20）到「豚」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是日本武田麟太郎的好敵手，可見對吳希聖推崇有加。其他讚譽者請參閱羊子喬，〈光復前的臺灣文學：社團論〉，《聯合報》，第12版，1979/7/2。以及

作成功虜獲讀者與評論者的注目，〈豚〉一文與楊逵的〈送報伙〉一同成為「臺灣文藝聯盟」年度的傑作，獲得獎勵金的殊榮⁹。

相較於楊逵、呂赫若、龍瑛宗等人的辛勤筆耕，吳希聖在文壇上可謂曇花一現，沒有留下太多作品。蒐羅現有報刊雜誌，其可知的作品，除了〈豚〉之外，可見的有在《臺灣文藝》二卷一期發表的〈乞食夫妻〉，以及《臺灣文藝》二卷三期〈人間·楊兆佳〉兩篇文獻。其餘存目者，計有刊登於1933年《臺灣新民報》上的〈麗娜的日記〉，〈黑狗哲學〉兩篇文章。由於吳希聖使用日文寫作，目前也僅有李永熾將〈豚〉一文譯出，更使得吳希聖的專論相當罕見，一直到2008年由吳亦昕著〈日治時期以日語創作臺灣「鄉土文學」的雙重意義——以吳希聖〈豬〉中的日語策略為例〉¹⁰一文，方才有第一篇專論。

（二）吳希聖的記者生涯與文藝社團活動

吳希聖寫作〈人間·楊兆佳〉時正在擔任《臺灣新民報》記者，他與楊肇嘉以及《臺灣新民報》之間的關連性，宜先澄清。

《臺灣新民報》的前身是1921年的《臺灣青年》以及1923年創辦的《臺灣民報》，都是以資助「社會教育」、啓發臺灣民眾的智識與文化為宗旨¹¹。1927年《臺灣民報》遷回臺灣發行，當時臺灣島內社會運動以及議會請願運動方興未艾，臺灣文化協會等團體相繼成立，知識界不斷有擴大發行日刊的倡議，於是1929年1月「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於臺中市大東信託公司召開創立大會，資金日幣36萬2,500

巫永福在「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中的發言記錄，黃武忠紀錄，〈傳下這把香火：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聯合報》，第12版，1978/10/23。

⁹ 許倍榕，〈30年代啓蒙「左翼」論述——以劉捷為觀察對象〉（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63。

¹⁰ 吳亦昕，〈日治時期以日語創作臺灣「鄉土文學」的雙重意義——以吳希聖〈豬〉中的日語策略為例〉，《臺灣文學學報》12（2008），頁81-101。吳亦昕認為，吳希聖的〈豬〉一文，能夠嫻熟運用日語，特別是混雜了九州、關西、東北方言，乃至臺灣的俗語，將臺灣的「鄉土色彩」成功表達出來。然而，吳希聖作為被殖民者，卻能以支配者的言語來創作己身文學，發展出一套抵抗帝國文學的方法，並為臺灣人尋求的主體性，在充滿矛盾的環境中，開創出一條道路。

¹¹ 兩份刊物的創辦宗旨參見王敏川，〈臺灣教育問題管見〉，《臺灣青年》3：5（1921），頁35。（本文連載於3卷4號、5號兩期。）以及慈舟，〈臺灣民報創刊詞〉，《臺灣民報》1（1923），頁1

圓，董事長為林獻堂，常務董事羅萬俤，延請楊肇嘉擔任監事。於 1930 年 3 月 29 日《臺灣新民報》正式成立，但仍以週刊形式發行¹²。

楊肇嘉曾經詳細地將 1930 年週刊時期《臺灣新民報》組織成員羅列出來，並沒有吳希聖的名字¹³。在臺灣知識界屢經爭取，《臺灣新民報》至 1932 年從週刊轉為日刊，有機會與日本人發行的報刊一起在公共領域競爭。《臺灣新民報》於 4 月 15 日正式發行日刊，以中文為主體，三分之一為日文。報社組織為之擴增，總社設在臺北市，有編輯局，下分整理部、政治部、經濟部、通信部、學藝部、調查部，另有營業局、印刷局，分社相繼成立，計有上海、廈門、東京、大阪、臺中、基隆、新竹、嘉義、彰化、臺南、高雄、屏東、花蓮等 13 處。為了因應業務的激增，《臺灣新民報》大量延攬臺灣知識份子投入，吳希聖、黃得時、陳逸松、黃朝清等人先後加入了日刊的編採工作¹⁴，也可以印證吳希聖寫作〈人間·楊兆佳〉一文時，與楊肇嘉有著長官與部屬之間的關係。

吳希聖加入《臺灣新民報》的時間，適逢報社轉為日刊的 1932 年之後，這段期間也是他小說創作的高峰期，他也同時積極參加了各種文人活動，根據有限的資料可以證實，他在 1934 年中曾經參加過「臺灣文藝聯盟」第一回臺灣全島文藝大會¹⁵，並於年底參與《臺灣文藝》的北部同好者座談會¹⁶。加上前文所提及，吳希聖也曾加入「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起《福爾摩沙》雜誌，可見人在臺北的吳希聖，在 30 年代初期到中葉，相當熱中於文藝活動，也勤於發表創作。

¹² 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3），頁 552-559。

¹³ 楊肇嘉，〈臺灣新民報小史〉，《楊肇嘉回憶錄》，頁 426。

¹⁴ 同上註，頁 435。

¹⁵ 1934 年 5 月 6 日臺灣文藝聯盟成立時，吳希聖曾與劉捷、江賜金、蔡德音、林月珠等人一同出席在臺中市西湖咖啡館舉行的「臺灣文藝聯盟」第一回臺灣全島文藝大會。許倍榕，《30 年代啓蒙「左翼」論述——以劉捷為觀察對象》，頁 34。

¹⁶ 吳希聖於 1934 年 12 月 23 日，與時任《臺灣新民報》記者的劉捷，一同出席《臺灣文藝》北部同好者座談會，地點在臺北 OK 咖啡廳。此次座談會由劉捷擔任主席，其他出席人士尚有：黃純青、黃得時、陳君玉、陳鏡波、曾壁三、周井田、鄭德來、高金福、蔡德音、林月珠、廖毓文、朱點人、林克夫、陳泰山、林登貴、許滄浪、黃日春、王錦江、徐瓊二、張深切、張星建、江賜金、吳逸生、光明靜夫。參見劉捷年表：<http://www.philo.ntu.edu.tw/chinese/files/13.doc>。

三、〈人間·楊兆佳〉敘述的新聞真實面

吳希聖寫作〈人間·楊兆佳〉一文，歷來評論者與翻譯家興趣闕如，實則和這篇文章涉及的新聞事實複雜，加以文體介於小說與新聞特寫之間，需要多所補充與詮釋，否則時過境遷，讀者較難瞭解其用心良苦。事實上，〈人間·楊兆佳〉的寫作背景，本於當時轟動一時的楊清溪空難事件，而文章中的「楊兆佳」，亦即《臺灣新民報》監事也是臺籍政治運動家楊肇嘉，不但真有其人、其事，吳希聖還希望藉此文呼應當時社會運動中，彰顯臺灣人自信與認同的重要精神。以下就針對楊肇嘉贊助楊清溪鄉土訪問飛行的背景，楊清溪遇難的新聞始末，以及楊肇嘉哀悼楊清溪的各項紀錄，詳加介紹，並比對〈人間·楊兆佳〉所陳述的事實，以作為判斷此文文體之基礎。

（一）楊肇嘉贊助鄉土訪問飛行的背景

從 1934 年，臺灣史上第一位擁有三種機型駕照的二等飛行士楊清溪（1908-1934），在眾人的贊助下購得一架中古 230 匹馬力的薩爾牟遜型偵察機，準備進行一系列的鄉土訪問飛行。而在當時，最大力支持且主導這次活動的，正是吳希聖以諧音寫入〈人間·楊兆佳〉的楊肇嘉（1892-1976）。

楊肇嘉是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重要的發起者之一。他出生於臺中牛罵頭牛埔子（今清水鎮秀水）佃農楊送之家。1897 年，過繼給臺中縣清水鎮首富、前清誥授奉政大夫楊澄若為養子，改名楊肇嘉。因養父家境寬裕，1901 年，得以進入牛罵頭公學校就讀。1909 年（明治 42 年）留學於東京京華商業學校。1920 年（大正 9 年）地方制度改制，楊肇嘉任清水街長，向當局爭取海線鐵路經清水、沙鹿之建築計劃。1925 年（大正 14 年）不顧總督府之壓迫，代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赴東京請願。1926 年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同時任東京新民會常務理事，並結交日本政界開明人士，厚植臺灣民族運動之根基。1930 年林獻堂等人致書楊氏，請其回臺主持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自此楊肇嘉以其旺盛的鬥志與人望，透過辦理媒體、贊助藝文活動與鄉土飛行等，為臺灣的民主與地方自治運動，與日人展開一連串的周旋。

據楊肇嘉的回憶文字所載，他希望看見臺灣人能夠翱翔於天際，與日本人並駕齊驅，全然是民族自尊心的作用，楊肇嘉強調：

假若由一個臺灣人駕駛一架由臺灣人出資購買的飛機，能夠完成橫渡太平洋的壯舉的話，那實在是一件為大漢民族揚眉吐氣的事情！假如他有此舉的話，所有購機的費用可由我個人負擔¹⁷。

爲了替跨越太平洋的飛行暖身，楊肇嘉與楊清溪企畫了一趟環島的「鄉土訪問飛行」。楊清溪本來擬定的航線是從東京起飛，經朝鮮、北華、廈門到臺灣，開拓亞細亞最短之航空路¹⁸。但當向中國申請假道飛行時，卻因被視爲日人未獲批准，於是將飛機運到臺灣組裝，並更改飛航計畫爲環島飛行¹⁹，楊肇嘉不僅出錢幫楊清溪購買飛機，命名爲「高雄號」²⁰，還爲楊清溪在行前舉辦介紹會，透過輿論的宣傳以及後援會的組織，讓全臺知道此項壯舉（見圖一）。



圖一、楊清溪與高雄號合影
資料來源：張炎憲、陳傳興：《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頁141。

楊清溪的「鄉土訪問飛行」是一系列社會運動的一環，是繼江文也等旅日音樂家的鄉土訪問演奏會後接續進行，楊肇嘉贊助這些活動，都有意藉由優秀臺籍人士的表現，提振臺灣人的自信心與認

同。當時，楊清溪繞島飛行的計畫，因爲報章媒體的傳播，很快就受到了本島官方單位與民間的重視，紛紛表示樂觀其成，各地並接連成立後援會²¹。彼時，臺北後援會會長爲陳清波，臺中後援會會長則由楊肇嘉擔任。在楊肇嘉的公關活動下，都

¹⁷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276。

¹⁸ 〈本島飛行士 楊君歸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1933/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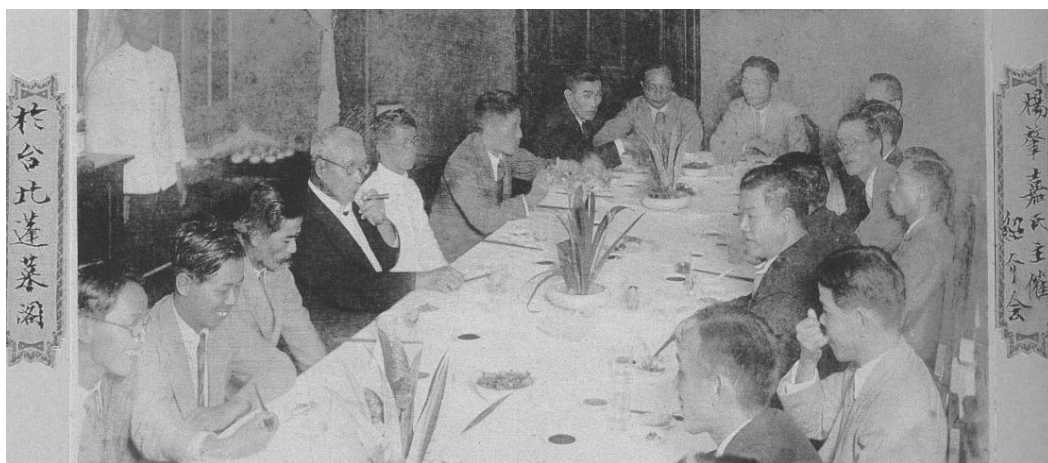
¹⁹ 〈鄉土訪問をかねて 全島一周の飛行 二等飛行士の楊清溪氏が 廿七日來著、今月末に決行〉，《臺灣日日新報》，第11版，1934/9/26。

²⁰ 據莊永明，《臺灣第一》（臺北：時報，1995）所載，楊清溪的飛機爲楊家兄弟出售十甲田地購得，與《楊肇嘉回憶錄》所載有極大之出入，據楊肇嘉表示，飛機的出資購買他當時未說起，這是他一向做事的風格與原則，恐怕也因此外人未必得知。參見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277。

²¹ 〈飛行士の後援會組織〉，《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4版，1934/9/27。

成為當時媒體顯著報導的新聞，更引起萬人空巷的矚目。

楊清溪當時所規劃的路線，乃是開著「高雄號」從臺北練兵場出發，行經臺中、臺南、岡山、右沖、屏東、臺東、花蓮港，再繞行回臺北²²。在行前的 10 月 10 日，全島重要人士聚集為楊清溪在蓬萊閣舉辦了介紹會，與會者有貴族院議員辜顯榮、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劉明朝、蔡式穀等二十餘人（見圖二）。楊肇嘉在會上除向眾人介紹楊清溪外，並詳述其經歷，希望藉眾人之力喚起輿論的重視²³。



圖二：飛行士楊清溪紹介會

資料來源：張炎憲、陳傳興：《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頁 141。

後來，這次的鄉土飛行果然因為各報紛紛報導，飛行時刻也事先一一公佈，全地各地民眾皆熱烈等待著「高雄號」從上空凌空飛過。17 日當天，深川遞信部長鶴庶務課長、志村憲兵隊副官等官方日人，加上陳清波、楊肇嘉等本島人士，到場替送行，並由鶴氏、楊氏、林氏三人之女為其送上花束（見圖三）。²⁴由於天候不佳，出發時間比原訂晚了一個多小時，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飛行，11 點半在屏東著陸，接受各方的道賀²⁵。午後因為東部氣象惡劣，乃取消東臺灣的航行計畫，於 12 時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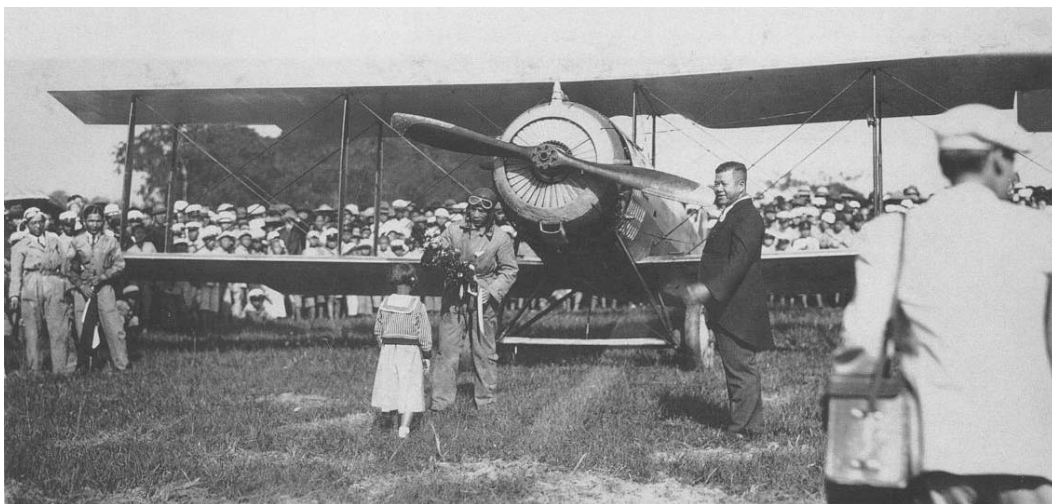
²² 〈楊飛行士 鄉土訪問 十七日決行〉，《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4 版，1934/10/4。

²³ 〈楊飛行士 全島一週 開紹介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4 版，1934/10/10。

²⁴ 〈楊君鄉土訪問 臺灣一周飛行 受關係者多數送行離陸〉，《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0/18。

²⁵ 〈屏東飛行場に著陸 東海岸廻りを取止めて 午後零時半臺北へ歸還飛行〉，《臺灣日日新報》，

分沿西海岸返航。往北行到臺中，因沙塵過大不得不迫降於通宵海灘，並暫宿一夜²⁶。隔日，9 點 14 分離陸，10 時 20 分抵達臺北練兵場。在現場向服部參謀報告完情況後，接受《臺灣新民報》社致贈的花束，並向軍部、督府、臺北後援會諸氏及楊肇嘉等人致上簡單謝辭²⁷。



圖三：楊清溪中部訪問飛行的歡迎會

資料來源：張炎憲、陳傳興：《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
（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頁 142。

從《臺灣日日新報》的密集報導可以看出，官方與民間都非常重視這一次飛行的成敗。民間後援會所提供的支援以及民眾的歡迎自不待言，日人官方、軍方以及警方也都出現了層級不低的人士到場關切。加上報導媒體的熱烈宣傳，使得鄉土訪問遂行的當天各地民眾皆熱烈等待、歡呼著「高雄號」從上空凌空飛過，宛如一場全島性的嘉年華會。那麼對於官方來說，楊清溪此次鄉土飛行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在 10 月 20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上，記者採訪了服部航空參謀，服部認為這一次的大成功其意義乃在於：軍事的民間航空思想鼓吹的確立，臺灣優秀飛行士的出現

夕刊第 2 版，1934/10/18。

²⁶ 〈高雄號不時著 通宵海水浴場 後車輪小破楊君無事〉，《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4 版，1934/10/19。

²⁷ 〈高雄號飛歸練兵場 由本社及民報贈呈花束 夜出席陳氏招宴〉，《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0/20。

是期待已久的契機，國防議會聯合總部中的航空部，也希望臺灣能夠早日出現活躍的一等飛行士²⁸。可見在同一則新聞事件中，日人與臺灣知識分子各自有著不同的詮釋與期待。

（二）楊清溪遇難的新聞始末

由於前次鄉土飛行未能取道東部完成歷史性的環島，楊清溪決定再行策劃並於同年 11 月 3 日繼續付諸行動。11 月 1 日，「臺灣軍司令部」批准了他的環島計畫航程。3 日清晨，先是與武內機關士駕機飛往花蓮港，因高空雲層遮蔽視線，深覺危險於是先行返航，並於臺北上空五百公尺處表演迴旋兩圈方才著陸。等待天候期間，爲了感謝贊助的友人，乃安排特別的載客飛行。大稻埕商人王德福頗爲期待，要求他人先讓其登機。8 點 19 分，楊清溪駕機在臺北上欲著陸時，因恐撞擊新店溪提防，於是快速向右拉昇急駛，卻因高空颶風吹襲，突然失速從 16 丈高空墜下。楊氏當場慘死，王氏亦於被救出後的十分鐘死亡²⁹，爲臺灣史上第一次有臺籍人士死亡的空難事件。

空難發生的當日是週末，臺灣各大報以及大阪朝日新聞社臺北通信局，都競出號外，報導這項噩耗，第二天，更以頭條新聞再詳加報導。主管日本民航事業的遞信大臣，於獲悉此不幸的報告，下令追贈他爲「一等飛行士」，以追念這一位臺籍航空彗星³⁰。

楊清溪發生空難之時，楊肇嘉人在臺中家中，一聞噩耗立刻北上處理。在回憶錄中僅簡要提及：「當時我在臺中家中，惡耗傳來，恍如晴天霹靂，大感意外，立赴臺北處理善後。」³¹這也就是吳希聖在〈人間・楊兆佳〉一文開始，以細密的筆法寫主人翁搭火車北上，趕赴《臺灣新民報》社，查證此一惡耗：

今早十點左右一收到電報，兆佳就火速搭了十二點十九分出發的快車北上。

²⁸ 〈今日の飛行は大成功 服部航空參謀の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2 版，1934/10/10。

²⁹ 〈楊飛行士墜落慘死 三日於臺北市飛行中 同乘王氏未幾繼亡〉，《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1/5。

³⁰ 莊永明，《臺灣第一》，頁 151。

³¹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278。

在車上已把電報讀了上百遍，但他還是抱著懷疑的態度，不斷祈禱著如果是弄錯就好了。雖然明白的寫著「楊飛行員墜機身亡」，但他無論如何都不相信，不！是根本不願意相信。

在報社中，閱讀到當天的號外，方始確認。

吳希聖在文中大篇幅的引用《臺灣新民報》當日的號外：

……由於雲層太厚及強風的關係，於上午七時十分左右再度返回練兵廠。此外……起飛後在臺北市上空盤旋飛行……在臺北及近郊上空迴繞兩三圈後準備從練兵廠南側著陸時，突然向右急駛並向南方旋升，機體就像翻筋斗似的栽下墜落。時間為上午八時二十六分，楊飛行員當場殞命。軍方官兵前往探察，對其慘狀全體無言以對。接到此一惡耗的督府及軍方已儘速派出代表……見到失事現場及楊飛行員慘不忍睹的遺體，眾人莫不流下同情的淚水。

對照當時的其他媒體的描述，並無太大的出入³²。

繼而，吳希聖寫出主人翁到「稻江會館」探視楊清溪遺骸的場景。根據《臺灣日日報》的報導，楊清溪的遺體被納入棺木，送往稻江會館，各地來探視與哀悼者紛紛前來，徹夜哀悼³³。

離開大稻埕的「稻江會館」後，主人翁前往出事地點，文中寫到：

靠近一看，倒栽在蘿蔔園內的「高雄號」機頭插入土中，殘破的機身笨拙的指向天空，就好像是令人感動落淚的標本一樣。昔日英姿煥發的模樣已不復見，像是變成了飛機的木乃伊。暮色低垂的練兵場周遭一個人也沒有，眼裏所見淨是蘿蔔園內好奇的觀望者留下的亂七八糟的腳印。「高雄號」看來顯得格外的孤單淒涼。

這一段細膩的寫景，對照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號外中的照片（參見圖四），可說是如出一轍，只不過新聞媒體的報導為：「被強風吹煽。由十六丈低空墜落。如杖

³² 〈島民愛慕の烏人 嗚呼！楊飛行士慘死 三日體育デー奉祝飛行中 五十米の低空から墜落〉，《臺灣日日新報》，號外 88a 版，1934/11/3。

³³ 同上註。

插在土中。³⁴」較為單調，而吳希聖以不斷對比的文學筆法，把失事現場的哀傷，以及飛行員壯志未酬的淒涼，寓意在文字中。



圖四：高雄號墜落蘿蔔園的照片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號外 88a 版，1934/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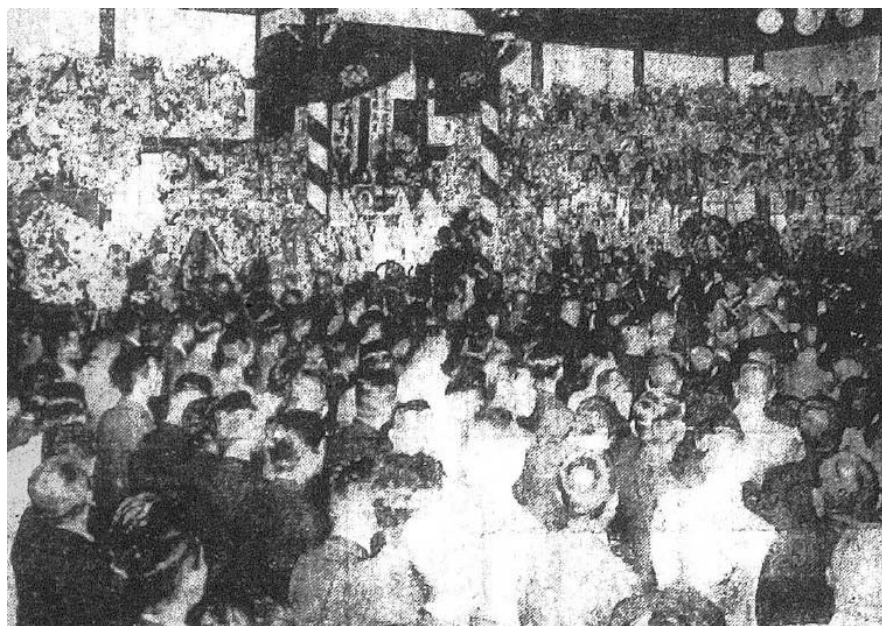
（三）楊肇嘉哀悼楊清溪的本末

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楊清溪的後援會在三月七日下午三時，假稻江會館佛堂舉行告別式，日本官員包括：總務長官平塚、臺灣軍參謀長桑木、交通局總長堀田、臺北市知事野口等人，中部後援會長楊肇嘉，以及郭廷俊、王得祿等人，都出席告別式，並朗讀弔詞³⁵（參見圖五）。楊肇嘉在回憶錄補充，他在告別式後送楊清溪的骨灰回左營，後來又在臺中舉行追悼會³⁶。

³⁴ 〈楊飛行士墜落慘死 三日於臺北市飛行中 同乘王氏未幾繼亡〉，《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1/5。

³⁵ 〈故楊飛行士告別式 官民五百餘名參列 在稻江會館嚴肅舉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2 版，1934/11/8。

³⁶ 報紙報導，根據後援會的規劃，訂七日午後四時，在稻江會館，舉告別式。同夜十時半，其遺骸將運到鄉里岡山郡。八時午後，二時在左營公學校，舉行本葬。時間的描述，均與吳希聖的描述相符。



圖五、楊清溪告別式在稻江會館舉行的盛大場面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第 11 版，1934/11/8。

楊肇嘉在臺中舉辦的追悼會，沒有受到媒體的矚目。目前可以查證到的新聞只有《臺灣日日新報》在墜機事件的次日，發了一個短訊，提及：「臺中後援會，即設祭壇於臺中市楊肇嘉宅。³⁷」所以如果要得知臺中楊清溪追思會的實況，就只得透過吳希聖的報導文字：

會場的正中央——祭壇的上方懸掛著亡者的大幅照片，兩側掛滿了一面面寫有「嗚呼哀哉楊飛行員」、「駕鶴西歸」、「壯志未酬」、「英雄蓋世」、「可歌可泣」等字樣的布幔。遺照的正下方則被楊兆佳、林獻堂、知事、大隊長、中部後援會、文藝聯盟、中央書局、各銀行、公司、學校等等致贈的花環層層包圍。這些花環遠遠看起來就像座小山丘，而亡者在這一片花團錦簇中被引領到天國的花園。引人熱淚的遺物螺旋槳與方向盤，獨佔了祭壇旁的桌子，人望極佳的沾滿了前來追悼者的指紋。

合。見〈七日在臺北告別式 八日鄉里岡山本葬 愛機於四日燒卻表弔〉，《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1/5。

³⁷ 〈臺中亦遙弔〉，《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1/8。

在這場追悼會中，不但哀戚，楊兆佳並在會中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鼓舞大眾：「不久也許我們之間誰將爲了你的犧牲而振奮，以雪恥的氣慨向大自然進行挑戰。」用以告慰楊清溪的在天之靈。

吳希聖在〈人間·楊兆佳〉一中，同時還記錄了楊肇嘉蒐藏失事飛機螺旋槳的事件。文中描寫悲傷的楊兆佳在失事現場撫視墜落的「高雄號」，並對幾近無賴的買主表示：「我叫做兆佳，是死去的楊飛行員的好友。你是否可將方向盤和螺旋槳讓給我呢？」在徵得買主同意後，吳希聖提及：

提著笨重的方向盤和螺旋槳，楊兆佳在告別式（臺北）的隔天晚上回到了臺中。圍著兆佳妻子手製黑色喪巾的飛行員遺照就放在廣大書房的正面，多位前來弔唁的賓客並排在香爐前。

這一段描述，就沒有出現在新聞媒體的描述中，不過從楊肇嘉的回憶錄以及照片史料中，可以窺探到事實。

楊肇嘉在回憶錄中點出：「我爲了永久紀念楊君的犧牲，除在失事地點爲他立碑外，並特請名家塑鑄他的銅像，和那『高雄號』的模機，永置於我的左右，以紀念這位爲開創臺灣航空思想而犧牲的英雄。」³⁸這段文字僅模糊地提及「模機」，恐爲傳記代筆者的筆誤。如參照近來出版的《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即可發現一張楊肇嘉追懷楊清溪的日常照片，在六然居的案前放著楊清溪的遺照，以及靠在桌邊一只折斷了的飛機螺旋槳³⁹（見圖六），可以充分證實吳希聖寫作內容完全真實有所本。

³⁸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277；同時參閱周明，《楊肇嘉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114-117。

³⁹ 張炎憲、陳傳興，《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頁 147。



圖六：楊肇嘉與楊清溪遺照以及「高雄號」螺旋槳的合照

資料來源：張炎憲、陳傳興：《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頁 147。

四、〈人間·楊兆佳〉的文體論

經過史料與文本的比對，初步可以發現，吳希聖的〈人間·楊兆佳〉一文，並沒有虛構事實，而是本於事實寫作。但其書寫上動用的小說筆法，在敘事上，是以第三人稱限制視角併用全知觀點，即透過主角人物楊肇嘉的敘述視野來觀看、描繪整體事件的發生，作者細緻描述主人翁楊兆佳的內心世界。究竟是否還屬於報導文學的範疇？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顯然得回到對報導文學本質的釐清。

報導文學最早的起源，顯然導因於新聞界向文學借火，企圖藉由文學的藝術性手法，讓新聞變得易讀、動人。然而，當報導文學此文類逐漸形成後，報導文學中的「報導」或「文學」，卻已然不同於本來的報導或文學之義。報導文學中的「報導」不單停留在單純的事實報導，也必須進一步挖掘事實背後所隱藏的意義，除了

外在活動的紀錄之外，也需要精神或人文層面的關照⁴⁰。因此，從1930年代茅盾、楊逵等人對報告文學的提倡之始⁴¹，其介入性與社會性的要求就比其他文類更為強烈。像吳希聖作為報社記者，當許多對抗當道的文字不能透過媒體刊行，轉以小說筆法，翔實記錄事件，希望能召喚社會的良知良能，聚合社會力量，解決社會問題與困難，如以當代的報導文學理論觀之，實有認定為報導文學的空間。

簡言之，近年來報導文學研究上注意到，「新聞報導是客觀」的看法已經遭到修正⁴²，研究者多不再認為記者能像鏡子一樣反映社會真實。例如文化研究學者Carrage就指出，從建構論觀察新聞，會發現新聞媒體並非如客觀主義或守門人理論所描述，新聞是客觀事實的反映，而是一種以符號活動對社會與政治真實的描述，因此不應把新聞單純看作是傳輸過程（transmission）而已，而會對社會個體、人物、事件進行再定義，改變原有的權力結構⁴³。文化研究的巨擘Hall更進一步表示，媒體僅能忠實地以符號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既有組織權力與秩序⁴⁴。綜上所述，報導文學作家的任務並不在於如實的客觀反映事實而已，同時報導文學作品的批評，更要透過瞭解作品中展現出來的深層意義，澄清文本是在何種社會運動、政治體系以及作者抗爭等一連串建構社會真實的過程而成。

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針對吳希聖的〈人間・楊兆佳〉一文，先討論如何與小說互文，而能夠不損其報導文學的內涵。其次就其報導文學「再現」問題，進行更進一步的深思，跳脫過往深陷於主客觀對立中的糾葛，以「再現」理論作為方法學⁴⁴，

⁴⁰ 與小說、散文、新詩等文類相比，報導文學相當被要求要與社會聯繫，甚至強調其社會性功能者，這種要求除了是其文類本身的特色，也與報導文學在臺灣興起的時代背景有著若干的關係。參見楊素芬，《臺灣報導文學概論》（臺北：稻田出版社，2001）第四章〈七〇年代臺灣報導文學興盛的原因〉。

⁴¹ 參見茅盾，〈關於「報告文學」〉，《中流》11（1937），及楊逵，〈談「報導文學」〉、〈何謂報導文學〉、〈報導文學問答〉，收入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1），第九卷・詩文卷（上）；〈實在的故事〉，收入《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

⁴² Carrage, K. M. (1991). News and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coverage of the West German Green Party by the News York Times.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28.p1.

⁴³ Hall, S. (1991).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In Avery, R. K. & Eason, D. (Ed.),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88-125.

⁴⁴ 有關報導文學的「再現」問題，相當值得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晚近紀錄片曾提出過「真實再現」

解讀這篇富有社會意涵的作品。

（一）楊達的評論與文體定義

楊達是少數批評吳希聖此文的作家，楊達於民國 50 年（1961 年）於綠島獲釋回臺，經友人介紹整理、並代筆撰寫《楊肇嘉回憶錄》，隔年因史實採錄與意見歧異，楊達辭去了撰寫工作，對楊肇嘉的評價卻始終正面，認定楊肇嘉是理智、有氣魄的性情中人，因之對吳希聖在〈人間·楊兆佳〉一文中，將楊肇嘉描寫得「婆婆媽媽、多愁善感」，深感不滿。楊達繼而指出：

吳希聖君的小說〈楊兆佳其人其事〉（《臺灣文藝》三號）就沒有把他的性格寫得很正確。以他為核心所支持的飛行員楊清溪先生在臺北墜機慘死時，他的確十分悲痛，就像〈楊兆佳其人其事〉中所描述的那樣。但是，他絕對不像小說中那樣裝模作樣。不如說他認為這是命運的安排，很快地就認命了。……而在埋葬楊清溪先生的同時，他馬上開始活動，讓彭金國君接續楊清溪先生。他去東京時購買了一架飛機，然後讓彭金國君出發去東京。他愛好科學，憎恨不合理之事；愛好進步，喜歡大眾有更好的生活。他重視日常生活的改善，更勝於重視理想。⁴⁵

楊達的評論反映了兩個問題：一為，指稱吳希聖對楊肇嘉的形象描繪不真確、偏離了現實。二為，認定吳希聖此文為小說，並非報導文學。

吳希聖是否準確地描述出楊肇嘉的形象，恐為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細讀〈人間·楊兆佳〉一文，縱然多處渲染了他哀痛落淚的表情，但同時也鋪陳出楊肇嘉回應現實的積極作為。以楊達提及彭金國接續飛行一事，在〈人間·楊兆佳〉文中，楊兆佳的一段話也為此設下伏筆：

的概念，「真實再現」是彌合敘事觀點、增強電視紀錄片可視性的一種重要技巧，其在紀實性的基本要求下，企圖在有限的聲音、影像等等資料下，透過蒙太奇等虛擬化的方式，營造「真實」的氣氛，縫合敘事的裂痕、表現人物的情感。由於此等所涉問題相當龐雜，筆者將另文討論有關報導文學的再現議題。有關「真實再現」的概念參見蔡元，〈真實再現與歷史紀錄片〉，《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2003），頁 84-85。

⁴⁵ 楊貴（楊達），〈楊肇嘉論〉，《臺灣新民報》，1935/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182-191。涂翠花譯，〈楊肇嘉論〉，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194。

「楊飛行員駕著老舊的飛機飛行而失事讓大家為他抱不平，但其他的飛行員不也是開著這種飛機？也有人說要在失事地點立記念碑。雖然說的很有道理，但如果有這些錢的話，我倒想買一架飛機讓其他飛行員來駕駛……。」沒有私人飛機的飛行員彭金國聽到想買下這架飛機讓其他飛行員駕駛這段話，抬起頭來的瞬間正好接觸到兆佳的眼神。

在日據時期共有 8 名臺灣籍人士取得商用航空飛行員之資格，其依序分別為謝文達、徐雄成、陳金水、彭金國、楊清溪、賴春貴、黃慶、張坤燦，彭金國在楊清溪環島飛行的過程中，就擔任其助手，在楊清溪殉難後，楊肇嘉確實協助了彭金國購買「臺灣號」，賡續了楊清溪的願望，確實也顯示出楊肇嘉不是一個埋首於哀傷的人，總能夠往正面與進取的面向發展。

吳希聖不僅提及楊肇嘉將尋求新的飛行者，更透過主人翁廣泛討論臺灣政治、文化、體育、飛行等層面的現狀，鼓勵朋友們要從哀傷中走出，面對困境，走向未來，他激勵友人：

臺灣的現狀可用難產二字來涵蓋。不只是飛行問題，自治問題、義務教育、文化事業、還有工商問題都處於難產的狀態。今後請大家同心協力一同為臺灣盡力。是為了一人而對萬人坐視不管，還是犧牲一人使萬人得以生存？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這段描述，寫出了楊肇嘉非凡的氣魄，他把政治運動寓於文化、體育、教育乃至飛行的事件中，藉此將信心注入缺乏自信的臺灣人心中，並不像楊達所批評的如是軟弱。

另一方面，楊達將〈人間・楊兆佳〉視為小說，實與他的寫實主義文學理念有關。楊達眼中的「寫實」並非一般我們所理解的寫實主義，而是更接近馬克斯、恩格斯進步性與典型化的文藝美學。在〈時代の前進の爲めに〉中，他談到「應該徹底打倒那些視細節描寫為生命的文壇上的文藝，應該盡量多刊載具有行動精神的作品，即使技巧粗糙、生澀，我們還是應該重視其精神對大眾的影響力量」⁴⁶在〈新

⁴⁶ 健兒（楊達），〈時代の前進の爲めに〉，《行動》3：2（193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124。邱振瑞譯，〈何謂報導文學〉，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文學管見〉中，他更明白的表示：

寫實主義之病根並非在寫實主義本身，而是在誤把自然主義的末流當成寫實主義。寫實主義是要在自然、人生、社會的真實性中瞭解這些概念，絕對不是唯心式的觀念論，也不是唯物式的機械論。……寫實主義是從事物的發展性中來瞭解事物，封閉在小小的象牙塔中的私小說、心境小說是自然主義的末流，而不是寫實主義，理由就在於此。寫實主義是結構性的東西，其本身就擁有理想。⁴⁷

是以，楊逵提出以「真實的寫實主義」來取代「社會寫實主義」的構想，認為「用科學的手法來觀察現實，是科學思想進步的今天最能夠給讀者真實感、引起共鳴的」⁴⁸。從楊逵對「寫實」的詮釋來看，吳希聖這篇對楊兆佳形象下了頗大功夫的作品，顯然要被歸為「視細節描寫為生命的文壇上的文藝」。儘管是以社會真實事件作為素材，但是在文學的形式與人物的塑造上，卻因動用了太多不真切的內心敘述，離脫了社會主義行動者的正面形象，顯現不出一個強調「發現真實」、「文學大眾化」的作家圖像，與其稱其為具戰鬥性的報告文學，倒不如稱為小說較為合理。

不過，作為報導文學的提倡者，楊逵曾對報導文學下了一個較為寬鬆的定義：第一，極為重視讀者；第二，以事實的報導為基礎；第三，筆者對應該報導的事實，必須熱心以主觀的見解向人傳達⁴⁹。因此在形式上，報導文學可以是小品文、書信和日記，甚至小說、詩歌、紀行文都可以納入⁵⁰。顯然在楊逵心目中，報導文學是最簡單、最自由奔放的寫作方式，是反映時代的最佳文學形式。不過楊逵仍然為報導文學懸下幾道禁律：第一，報導文學絕不是「自慰式」的寫作方式，務求讓讀者

124。

⁴⁷ 楊逵，〈新文學管見〉，《臺灣新聞》，1935/7/29—8/14，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280-304。／陳培豐譯，〈新文學管見〉，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315。

⁴⁸ 楊逵，〈文藝批評的基準〉，《臺灣文藝》2：4（193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154-162。／增田政廣、彭小妍譯，〈文藝批評的標準〉，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168。

⁴⁹ 楊逵，〈報告文學とは何か〉，《臺灣新民報》，1937/4/2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500-502。／邱慎譯，〈何謂報導文學〉，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503-505。

⁵⁰ 楊逵，〈報告文學問答〉，《臺灣新文學》2：5（1937），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9卷・詩文卷（上），頁512-521。／邱震瑞譯，〈報導文學問答〉，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525。

完全理解。第二，報導文學雖然允許對事實做適度的處理與取捨，但絕不允許憑空虛構⁵¹。第三，報導文學與新聞報導和通訊不同，不能單純羅列事實。報導文學作為文學之處不在於虛構，而是要有「形象」，亦即描寫出某一事實或事件生動的姿態，讓讀者深刻地印在腦海裡，這就是文學的生命。第四，報導文學不能不講究作品的結構，也就是必須以良好的整理題材的方法，以便將內容或思想，更容易、正確、有效地引入讀者的腦海裡⁵²。如果以上述的標準，則吳希聖的〈人間·楊兆佳〉一文，是否屬於與小說互文，能夠對新聞事實進行適度的取捨，又避免新聞報導的單調無趣，塑造出生動的人物形象，而進而認定為報導文學？似乎也符合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

（二）報導文學中新聞與小說的互文

報導文學的體式，一般來說是以散文呈現，但不僅僅如此，也可以用日記體、書信、論文體、報告劇、議論體等。與楊逵所見相同，茅盾比較中外的報導文學後，就主張報導（告）文學不應當以體式為界限，而應以性質為主⁵³。換句話說，採用散文以外體式的報導文學作品，縱使將新聞報導與小說互文，只要有其高度傾向性、進步性、批判性與人文關懷精神，其內容以紀實為主，仍屬於報導文學的範疇中。

互文性係 Kristeva 所創造與提出的術語，1967 年她在《封閉的文本》（text close）中進一步將「互文性」作了明確的定義：「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現的其他文本的表述。」⁵⁴及至 1969 年她在《符號學：解析符號學》（“Semeiotike: Recherches pour une Sēmanalyse”）一書中補充：「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是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⁵⁵如用以詮釋報導文學的文體特質，不難發現其中鑲嵌著新聞、散文、傳記、小說等文體特徵，也不斷向新聞報導吸收內涵，

⁵¹ 同註 49，頁 503。

⁵² 同註 50，頁 525。

⁵³ 茅盾，〈關於「報告文學」〉，《中流》11（1937）。

⁵⁴ 蒂費娜·薩莫瓦約著、劭煒譯，〈發展和對話：廣義概念〉，《互文性研究》，頁 3。

⁵⁵ 黃念然（1999），〈當代西方文論中的互文性理論〉，《外國文學研究》，頁 15；李玉平，〈互文性批評初探〉，頁 11。

透過文學的筆法轉化而成。

吳希聖在寫作〈人間·楊兆佳〉一文時，臺灣文壇上沒有關於報告文學或報導文學的討論，但由於他從事新聞採訪寫作工作，應當也有機會貼身採訪楊肇嘉，使得他有機會本於事實，以小說筆法寫出了一則動人的報告文學。如果論者質疑其中有「虛構」的成分，事實上經過前文仔細比對楊清溪遇難前後的新聞媒體報導，不難發現〈人間·楊兆佳〉一文，一方面與新聞報導、號外互文，其所採納基礎的事實都排除虛構，務求有所本。另一方面，該文通篇的寫作上，則與小說互文，亦即向小說借用刻畫人物、描寫環境以及渲染氣氛的手法，必要時也可對事實做適度的處理與取捨，以想像力進行合理的推論與想像。於是，吳希聖藉由新聞報導、號外、小說的互文，巧合地為臺灣的報導文學創立了一篇開山鉅作。

筆者曾提出「鬆綁論」，認為報導文學不像純淨新聞寫作具有一定的形式，如果有必要，「新聞寫作」的常見框框應當可以打破。也就是在敘事的手法上，把事實穿插連貫起來，展開情節，應為可行的手法。為了讓讀者瞭解，縱令使用對話或一問一答方式，使文章與小說的敘事互文，本質上還是報導文學⁵⁶。在吳希聖的〈人間·楊兆佳〉中，不乏類似生動的書寫，例如楊兆佳在稻江會館哀悼楊清溪時：

聚集在稻江會館內的群眾一片鴉雀無聲，不久後此起彼落的傳出低泣聲。緊臨身旁的人連呼吸都小心翼翼。

「這位是死者的父親嗎？」

「應該是吧。你看他是那麼的哀痛，聽到他說的話，我也不禁要哭出來了」

「我也是……」

「有這麼好的父親，死者也會感到幸福吧～」

群眾們斷定他是楊飛行員的父親，同情的淚水流個不停。這並不是他們眼睛出了問題，若非不是自己的父親，誰會哭得如此悲痛？又有誰會如此的親近愛撫？看到這樣的場景，大家流淚感動不已。

用群眾猜測楊兆佳的身份，烘托他哀痛欲絕，以及和楊清溪情同父子的感情，更生

⁵⁶ 牧內節男著、林書揚譯，《新聞記者的風範和信念——新時代的新聞寫作》（臺北：人間出版社，1989），頁163-164。

動的刻畫出人物的面貌，其實並不會傷害事件的真實本質。

論者或謂，〈人間·楊兆佳〉通篇是以楊兆佳第三人稱限制觀點並混用了全知視角寫作，報導文學作者是否能夠進入受訪者心中，模擬其心態與感受？楊素芬曾以敘事觀點為例，指出報導文學因為對非虛構的要求，其敘述觀點不如小說來的較有彈性⁵⁷。一般而言，依照敘事觀點可以區分為：「第三人稱敘事，敘事者在故事之外，寫人物的外在行為」⁵⁸、「第一人稱敘事，敘事者在故事之外，寫人物的外在行為」⁵⁹以及「第一人稱的敘事，敘事者為故事中人，只寫人物（自身除外）的外在行為」⁶⁰三種。楊素芬就主張，當敘事者的客觀立場較強，屬於報導的語言成分必然增多；當敘述者的主觀立場強，注入較多量的個人意見，則文學的成分自然增強。楊素芬在該書中並未針對客觀或主觀立場的強弱問題，進行更進一步的說明，但是敘事人稱的不同，以及作者對此一題材所採取的介入方式，確實都是造成讀者在閱讀時，評估其可信度或主客觀強烈的重要指標⁶¹，顯然不代表報導文學不能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寫作。

放眼美國新聞界，採行非虛構寫作著稱者，如《冷血》（*In Cold Blood*）的作者卡普特（Capote）、《王國與權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的作者塔尼斯（Talese）以及伍爾夫。他們的風格包括重新創造記者或其他人可能聽不到的對話，以及描述主角在新聞情境中的思想與感情。舉例而言，吳希聖在寫到楊兆佳確認惡耗時，一時天旋地轉：

他感到喉嚨哽住，二樓的地板搖晃了起來。到底是如何走上三樓的部長室，他竟完全記不得了。好像是被兩三位記者支撐著走上狹窄的樓梯，但他卻也無法肯定。他甩了甩頭試圖喚回一些記憶，但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⁵⁷ 楊素芬，《臺灣報導文學概論》（臺北：稻田出版社，2001），頁59-61。

⁵⁸ 即以「他」的敘事者身份觀察整個故事的發展，但「他」是一名外在式的敘事者。有關「外在式敘事者」與「人物敘事者」的區別請參見麥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24。

⁵⁹ 即以「我」的敘事者身份觀察整個故事的發展，但「我」是一名外在式的敘事者。

⁶⁰ 即以「我」的敘事者身份觀察整個故事的發展，而「我」是一名人物敘事者。

⁶¹ 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臺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3（2005），頁179-181。

顯然吳希聖就捨棄了傳統媒體的純淨新聞寫作，進而採用小說的筆法，涉入了受訪者的內心世界。事實上，如果作者有機會接近所撰寫的新聞事件與人物，重新建構這些事件、人物與思想，就像寫純淨新聞的記者摘要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引言一樣地忠於現實，又能生動的展現事實⁶²，誰曰不宜？

原則上，報導文學的書寫絕對允許合理「推論」的，但是卻必須排斥毫無憑據的「想像」。「推論」從具體的史料中考證推敲，讓我們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想像則從某些基點引發，但必然添虛構的成分，破壞報導文學的紀實性格。綜合上述分析，報導文學既然是一種兼具藝術性與社會性的非虛構文類，有賴於從「報導」、「文學」兩方吸收養分，並透過對其他學門知識的整合，增加報導文學作品的深度與廣度⁶³。則〈人間·楊兆佳〉一文在這一點，正是成功地整合了史實與觀察，透過精巧的剪裁、設計，以及對當時臺灣人民歷史境遇深入推論與刻畫，在在都展現出報導文學創作的目標與精神。

（三）吳希聖再現出媒體無法言說的民族情懷

報導文學源於新聞學思潮的衝擊，其內涵並不只是「用文學的筆法報導」而已，新聞報導和新聞記者更需要提供完整的、有力的、深度的觸角，發揮創發性的思考效率，使讀者能接受一份真實、積極、震撼的報告⁶⁴。在吳希聖寫作〈人間·楊兆佳〉的年代，他任職於報社，受限於新聞報導格式的冰冷，以及日人對於報紙言論的箝制，在文藝刊物上為文，剪破新聞網的限制⁶⁵，讓讀者得以一窺新聞事件背後

⁶² John L. Hulteng. *The messenger's motives: Ethical problems of the news med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Press, 1985)，羅文輝譯，《信差的動機》（臺北：遠流出版社，1992）。

⁶³ 論者如鄭明嫻便以為，報導文學已是既存的事實，我們就應該突破文類觀念的束縛，讓報導文學有新生、蛻變、成長的機會，則科際整合才會有意義。所謂的科際整合，顯然指的是報導文學向新聞學、歷史學、人類學、攝影等等的借火。參見鄭明嫻，〈報導與文學的交軌〉，收入《當代文學氣象》（臺北：光復書局，1988），頁 83。

⁶⁴ 陳銘礪，《現實的探索》（臺北：東大書局，1980），頁 1-7。

⁶⁵ 新聞媒體的運作上，受限於人力、時間等限制，因此必須對記者採訪加以分工，記者必須受限於採訪路線，經常性出入特定地點，在特定時間限制下蒐集資訊，此一分工便形成了所謂的「新聞網」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a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1972), pp.660-79.

的脈絡關係，甚至暢言無法言說的民族情懷，在在發揮了報導文學的功能與時代價值。

特別在殖民地的言論環境中，大眾媒體上所呈現的「社會真實」，勢必是經過管控箝制以及意識型態化的，要不就是否認衝突存在，不然就是希望強行灌輸一致性與整體性。詳言之，當媒介也以強調國家領導的重要，肯定現有領導制度合法性為選擇新聞的依據⁶⁶，無疑使媒介成為塑造共識與合法性的意識構連的重要角色。此時，報導文學或其他文體的文學筆法所「再現」的真實，往往要比媒體所呈現的「客觀新聞」更要貼近真實。

近來報導文學文體的討論上，漸漸也有學者開始捨棄報導文學書寫必須絕對客觀的原則，改以建構論的觀點來討論報導文學如何再現社會真實。林淇瀋就曾引用文化研究學者 Hall 的詮釋，指出「再現」是一種意識形態論述，可以將語言文化的主體爭取到它所再現世界的方法之中，並且透過語言與論述加以「接合」（articulate），使我們活在自身與存在的實際狀況之間的一種想像關係。報導文學的書寫，顯然背後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與目的，從而要建構與再現出一套媒體、歷史或文學的言說中，難以彰顯出的意義與課題⁶⁷。

換言之，吳希聖之所以選擇以小說化的模式報導楊清溪殉難的事件，行文中不斷激勵著臺灣人的自信心，如在稻江會館時的喃喃自語：

你的死去絕不是徒勞無功，你的犧牲是非常寶貴的。你為臺灣民間航空史寫下精彩的第一頁，你所流的血不但激勵了數千位年輕人，更讓幾萬同胞覺得激動。

或如在臺中哀悼會中，楊兆佳慷慨激昂的發言：

上天是盲目的！讓一個不應該死去的人死了，在不該奪去他生命的時候硬是把他帶走了，這不是盲目是什麼？即使是犯人，我們也不容許上天做這樣的

⁶⁶ 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39-69.

⁶⁷ 林淇瀋，〈擊向左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臺灣史料研究》23（2004），頁 134-152。

判決。為使楊君在天之靈得以安息，我們有義務要興師問罪，為他進行復仇之戰。大自然如此逞起淫威是身為文化人的恥辱。我們不是為了個人的名譽，而是為不幸喪生的楊君與他心愛的飛機「高雄號」出一口氣。我們決不能忘了這點。所以我想最好的復仇方法，就是培養新的飛行員讓他繼續完成環島飛行的夢想。

這些發言都真切地再現出當時臺灣知識界的反抗聲音，也就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反抗，企圖通過文學書寫形式、接合上文藝運動與社會運動發展出集體自覺的新形式，掙脫意識型態的鎖鍊⁶⁸，更呈現出其時代意涵。

五、結語

龍瑛宗曾慨嘆：「由於殖民地經濟的刻薄，產生了楊華、吳希聖、鍾理和的文學，這些三個先驅作家，一輩子貧窮纏身，未獲文學上的善終，徒使我們黯然神傷。」⁶⁹相對於楊華與鍾理和近年來重新獲得研究者重視，創作量有限的吳希聖，卻更顯寂寥。

本研究從報導文學的角度解讀吳希聖的〈人間·楊兆佳〉一文，並比對歷史文獻，證實了該文本書寫策略上均以事實為依據。同時，本研究拋棄了過往報導文學研究中刻板的寫實理論，不亟亟於討論主、客觀的對立，而轉以「再現」的理念，觀察吳希聖的文本對現實模擬以及鏡象式的投射，發現確實能夠捕捉與展現現實，並接合社會運動的抗爭目的。如是發現就推翻了向陽、須文蔚編訂《報導文學讀

⁶⁸ Stuart Hall.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In Avery, R. K. & Eason, D. (Ed.),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88-125.另關於意識型態以及接合理論的討論，可參見 Stuart Hall. "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Brenda Devin, et. al.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II* (1989). *Paradigm Exemplars*. New York, Ca: Sage, pp. 40-52. Poonam Pillai. *Rereading Stuart Hall's Encoding/Decoding Model,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992), pp. 221-233.

⁶⁹ 龍瑛宗，〈張文環與王白淵〉，《臺灣文藝》76（1982），頁329-333。

本》⁷⁰後，學界認定楊達在 1935 年 6 月所發表的〈臺灣地震災區勘察慰問記〉⁷¹為文學史上第一篇報導文學作品，把臺灣報導文學的萌芽可以再往前上溯至 1935 年 3 月〈人間・楊兆佳〉一文發表時⁷²。

如果進一步比較楊達與吳希聖的兩篇報導文學作品，楊達〈臺灣地震災區勘察慰問記〉一文，以個人見證的角度觀察災情，用簡單的筆法描繪了當時災區的慘況，楊達的書寫距離理想的報導文學表現尚有段距離，作品體例上有些雜亂，書寫上未見良好的結構鋪陳；相形之下，吳希聖的〈人間・楊兆佳〉一文，結構井然，引證與親自採訪的新聞資料都翔實可靠，加上搭配生動的小說筆法，無論在人物個性的型塑、場景的描述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或許受到社會運動的意圖影響，部分的呼號與演說過於急切與直接，略顯急躁，但衡平評價其表現要比楊達的作品更顯成熟。

本文先就吳希聖〈人間・楊兆佳〉一文的背景語文體加以討論，事實上，楊清溪的飛行壯舉最後是以悲劇收場，但在楊肇嘉策劃下的鄉土訪問的飛行計畫，如與當時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與藝術活動相連結，事實上具有更深刻的文學傳播與社會文化意義：那是臺人在殖民統治的窘境，逞其所能與日本人抗衡，甚而憑藉各種文化符碼與意識型態機器爭奪詮釋權，希望在有限的媒介資源下，建立臺灣民眾的自信心與尊嚴。此一文化面向的討論，希望在未來能夠具體以論述呈現，更清楚描繪出吳希聖與楊肇嘉的思想深度，以及抗爭的策略與方法。

參考書目

〈七日在臺北告別式 八日鄉里岡山本葬 愛機於四日燒卻表弔〉，《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1/5

〈今回の飛行は大成功 服部航空參謀の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2 版，

⁷⁰ 向陽、須文蔚編訂，《報導文學讀本》（臺北：二魚出版社，2002）。

⁷¹ 楊達，〈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社會評論》1：4（1935）。收入彭小妍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204-217、218-229。原譯為〈臺灣地震災區勘察慰問記〉。

⁷² 論者如楊允言在〈臺語羅馬字書寫的花東報導文學初探——以《臺灣教會公報》1885-1911 年為例〉中即指《臺灣教會公報》中部分的篇章當為臺灣早期的報導文學。但觀其所舉引文，實為教會宣傳與早期西方報紙常見的通訊稿（newsletter），既非從文學著眼，也就難以置入「報導文學」的範疇。該文收入賴芳伶、須文蔚主編，《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8）。

1934/10/10

〈臺中亦遙弔〉，《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1/8

〈本島飛行士 楊君歸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3/8/11

〈屏東飛行場に著陸 東海岸廻りを取止めて 午後零時半臺北へ歸還飛行〉，《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2 版，1934/10/18

〈故楊飛行士告別式 官民五百餘名參列 在稻江會館嚴肅舉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2 版，1934/11/8 日

〈飛行士の後援會組織〉，《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4 版，1934/9/27

〈高雄號不時著 通霄海水浴場 後車輪小破楊君無事〉，《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4 版，1934/10/19

〈高雄號飛歸練兵場 由本社及民報贈呈花束 夜出席陳氏招宴〉，《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0/20

〈郷土訪問をかねて 全島一周の飛行 二等飛行士の楊清溪氏が 廿七日來著、今月末に決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1 版，1934/9/26

〈楊君郷土訪問 臺灣一周飛行 受關係者多數送行離陸〉，第 8 版，1934/10/18

〈楊飛行士 全島一週 開紹介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4 版，1934/10/10

〈楊飛行士 郷土訪問 十七日決行〉，《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4 版，1934/10/4

〈楊飛行士墜落慘死 三日於臺北市飛行中 同乘王氏未幾繼亡〉，《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4/11/5

〈島民愛慕の烏人 嗚呼！楊飛行士慘死 三日體育デー奉祝飛行中 五十米の低空から墜落〉，《臺灣日日新報》，號外 88a 版，1934/11/3

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臺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3（2005），頁 163-182

王敏川，〈臺灣教育問題管見〉，《臺灣青年》3：5（1921）

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聯合報》，第 12 版，1979/3/17

向陽、須文蔚編訂，《報導文學讀本》，臺北：二魚出版社，2002

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羊子喬，〈光復前的臺灣文學：社團論〉，《聯合報》，第 12 版，1979/7/2

吳亦昕，〈日治時期以日語創作臺灣「鄉土文學」的雙重意義——以吳希聖〈豬〉中的日語策略為例〉，《臺灣文學學報》12（2008），頁 81-101

吳希聖，〈人間・楊兆佳〉，《臺灣文藝》2：3（1935），頁 112-125

林淇養，〈擊向左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達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臺灣史料研究》23（2004），頁 134-152

牧內節男著、林書揚譯，《新聞記者的風範和信念——新時代的新聞寫作》，臺北：人間出版社，1989

茅盾，〈關於「報告文學」〉，《中流》11（1937）

徐路生，〈臺灣作家論〉，《臺灣新聞報》，文藝欄，（1935）

張炎憲、陳傳興，《清水六然居：楊肇嘉留真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

張深切，〈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臺灣文藝》2：2（1935），頁 78-86。

莊永明，《臺灣第一》，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5

許倍榕，《30 年代啓蒙「左翼」論述——以劉捷為觀察對象》，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陳明礪編，《現實的探索》，臺北：東大書局，1980

黃武忠紀錄，〈傳下這把香火：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聯合報》，第 12 版，1978/10/23

慈舟，〈臺灣民報創刊詞〉，《臺灣民報》1（1923）

楊素芬，《臺灣報導文學概論》，臺北：稻田出版社，2001

楊達（健兒），〈時代の前進の爲めに〉，《行動》，3：2（193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124。邱振瑞譯，〈何謂報導文學〉，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124

楊達，〈文藝批評の基準〉，《臺灣文藝》，2：4 號（193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154-162。增田政廣、

- 彭小妍譯，〈文藝批評的標準〉，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163-169
- 楊貴（楊達），〈楊肇嘉論〉，《臺灣新民報》，1935/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182-191。塗翠花譯，〈楊肇嘉論〉，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192-199
- 楊達，〈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社會評論》（東京），1：4（1937），日文。邱振瑞譯，〈臺灣地震災區勘察慰問記〉，《聯合報》，2000/1/4。並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1），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218-229
- 楊達，〈報告文學に就て〉，《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1937/2/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1），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466-468。塗翠花譯，〈談「報導文學」〉，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469-470
- 楊達，〈報告文學とは何か〉，《臺灣新民報》，1937/4/25，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1），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500-502。邱慎譯，〈何謂報導文學〉，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503-505
- 楊達，〈報告文學問答〉，《臺灣新文學》，2：5（1937），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1），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512-521。邱慎譯，〈報導文學問答〉，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522-530
- 楊達，〈新文學管見〉，《臺灣新聞》，1935/7/29—8/14，日文。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280-304。陳培豐譯，〈新文學管見〉，收錄於彭小妍前揭書，頁 305-325
- 楊達，〈「實在的故事」問答〉，《力行報・新文藝》4（1948）。現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1），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59-262
- 楊肇嘉，〈臺灣新民報小史〉，《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2007，四版），頁 403-436
-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2007，四版

- 劉捷，〈光復前的文藝評論〉，《聯合報》，第8版，1980/11/3
- 蔡元，〈真實再現與歷史紀錄片〉，《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2003），頁84-85
- 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3
- 鄭明嫻，〈報導與文學的交軌〉，《當代文學氣象》，臺北：光復書局，1988
- 鍾肇政、葉石濤編選，《豚》，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
- Kevin Carragee. "News and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coverage of the West German Green Party by the News York Times".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28(1991), pp.1.
- 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tuart Hall.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In Avery, R. K. & Eason, D. (Ed.),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1), pp.88-125.
- John L. Hulteng. *The messenger's motives: Ethical problems of the news med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Press, 1985)，羅文輝譯，《信差的動機》，臺北：遠流出版社，1992
- 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a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1972), pp.660-79.